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下，南韓也逐漸從一個威權國家轉型成為一個民主國家，南韓的民主化過程「市民團體」，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讓南韓的民主化過程更為順利，相較於其他轉型國家少了暴力。這些市民團體促進了南韓的民主化發展，南韓至九零年代，終結了長達四十年的獨裁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憲政體制國家。南韓以穩定、和平、漸進的方式完成民主轉型。

在韓國民主化進程中，公民參與對於促進並支撐民主制度的發展作用顯著。在韓國現代史上，有些公民群體（例如大學生，勞動和環保組織）在推動民主化、反抗極權制度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許多民間組織通過動員、組織各種政治力量或宣傳某些具體問題（如環境問題和勞工問題），參與到民主化運動中來。就這樣，韓國的公民社會獲得巨大發展，並越來越多的影響公共事務。從 1945 年韓國結束日本殖民統治算起，根據極權政體瓦解和逐步向民主過渡為兩個分水嶺，韓國民主化史上有三個關鍵時期。在第一個關鍵時期（1956—61），學生和城市知識份子不斷反抗李承晚極權統治的鎮壓及其腐敗。第二個關鍵時期（1973—80），由持不同政見者、新聞記者、自由職業者以及宗教領導人等組織的無數協會團體，在反對朴正熙極權統治的反維新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鼓舞作用。在第三個關鍵時期（1984—87），公民社會中的支持民主聯盟聯合了學生、工人和教會，並進一步吸收了中產階層。這些民間組織進行有效聯合，並接受由眾多的部門和地區組織構成的民族團體的領導；他們也通過各種聯合組織與政治上的反對黨合作。通過民間組織和反對黨的協調努力，在巨大壓力面前，極權政府不得不向公眾的民主化要求妥協。可以說，韓國民主化的最後階段，很好證明了「民主化的民眾主導模式」。從 1988 年開始，韓國社會進入民主鞏固階段。在這個階段，為韓國民主轉型貢獻很大的公民社會繼續通過實施各種政治和社會經濟改革，發揮著重大作用。

筆者將南韓之民主化之因，統整為以下幾點。第一、基層社會力量的匯集：一九八年年代後期，包括勞工、學生、農民等反抗政府的民主化社會運動中都強化了質與量，透過各方反對與抗爭勢力的結合與串聯，創造了可與政權鎮壓相對抗的條件。例如在 “*South Korea Confrontational Legacy & Democratic Contributions*” 文中就有提及幾個重要的南韓市民社會團體，在民主鞏固階段的政治改革中，民間組織重點關注了三項運動：（1）監督國會對政府的審查；（2）爭取公平選舉的落薦運動和落選運動；（3）推動司法改革運動。例如：公民監督國會審查政府機構聯合會（CSMNAIGO）這個組織給監督運動設定了兩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是記錄每個議員參加國會各委員會的情況，並評估他們的表現。為了提高評估和排位的公平性和客觀性，公民監督國會審查政府機構聯合會事先會就評估的基本原則和標準達成一致。第二個目標，公民監督國會審查政府機構聯合會事先就鞏固民主所需的關鍵改革任務列出一個一百六十六項的清單，並監督這些改革任務在各個委員會中是否被充分強調。這些關鍵的改革任務包括，制訂政策防止私立學校的腐敗行為、採取措施應對國家退休金制度過度擴張帶來的問題等。此外還有公民大選聯合會（CSGE）。公民大選聯合會計畫發起兩場不同類型的運動。第一個運動，需要產生一個名單，列出哪些政客不應被政黨提名參加國會選舉，並行動起來反對他們被提名（落薦運動）。第二個運動，如果上述黑名單裏有人被提名，就要行動起來反對他們參加選舉（落選運動）。除了多種多樣爭取政治改革的運動之外，韓國的民間組織同樣為經濟改革而奔走呼號。在所有呼籲經濟改革的運動中，主要由 PSPD 領導的爭取少數股持有者權利的運動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它曾試圖改變韓國的宏觀經濟結構。同樣，這場運動也可以被看作是韓國朝向經濟民主化發展的第一步。經濟民主化包含兩層涵義：一是整體的市場結構，而是企業的內部結構。就整體市場結構而言，學者們呼籲必須削弱家族企業集團（大集團）的巨大能量和影響力，以確保所有經濟行為體可以展開公平競爭。就企業的內部結構而言，有人指出，所有大型家族企業集團的內部結構都高度極權，阻礙了管理的責任落實和透明化。第二、中產階級的參與：中產

階層隨著經濟高度發展、生活水準提高增加並積極參與民主化運動，迴避政權與運動勢力全面對決的情況，打開協商妥協之道。南韓在 W.W. Rostow's 學者所提及的「雁行理論」下，南韓為第二層國家，在戰後以日本為首的帶領下逐漸經濟改革，經濟成長快速，與台灣、新加坡、香港等國號稱亞洲四小龍。快速的經濟發展，使更多的中產階級，接觸民主化運動，這也使南韓民主化有推波助瀾之效。這也如同學者 Barrington Moore 所述：「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第三、領導者的妥協：全斗煥政權與朴正熙的維新政權依班具有政治僵硬性。然而，以盧泰愚為中心的穩健派勢力逐漸抬頭制約了強硬派，使得全斗煥政權採取妥協之道。盧泰愚成為南韓近三十年來，第一位在軍人背景下，透過民主程序當選總統的候選人。在取得總統資格後，盧泰愚開始實施民主化措施，並與反對派領袖金大中與金泳三進行政治對話與相互協商，以獲得民主的共識，最後在對話與協商的過程中，南韓也完成民主穩定轉型與政權和平轉移的民主化目標。總體而論，南韓民主化在全斗煥默許讓步與盧泰愚的具體作為下，已經完成初步的目標，並自此奠定民主轉型與政治改革的基礎。因此，有諸多學者認為全斗煥與盧泰愚權力轉移的期間是導致南韓民主化發軔與開展的關鍵時期。最後，公民意識的轉變：隨著分裂體制的鬆懈、社會經濟的發展，使得傳統行為模式與公民斯為逐漸朝向開放話、自律化，其造成政治意識，從過去支持威權體制轉而支持民主政治。從南韓的例子也體現出學者 Adam Przeworski 所認為民主化的發生有以下三大原因。第一，民主可以獲的國際奧援。第二，民主可以提供一個解決之道，取得合法性，建立秩序與決策規劃。第三，威權體制下受益者的溫和派，也主張使用民主體制時。

近日，南韓前總統盧武炫自殺身亡的消息，震驚了國際社會。起因於前總統盧武炫被控貪污。為了不要浪費過多的社會成本以及洗刷自己的冤屈，盧武炫選擇以自殺的方式解決問題。筆者認為「貪污」事件是在許多轉型國家中所會面臨的問題，除了南韓外，台灣也正面臨相同的問題。這也是一般我們所稱的「凍結

式民主」(Frozen Democracy)。通常有以下特色。第一，市場威權主義的方式出現。第二，有形式民主的某些要素(政治競爭激烈、政治參與擴大、政治自由擴大)。第三，市場改革引進，但市場改革的受益分配不均，廣大民眾仍沒有享受到市場的好處，例如：南韓還是以大財閥為主。第四，政府不是用「共識」來處理社會衝突，而是「依法而行」。最後，權力的維持是靠「貪污、恐嚇、武力」來維持。某種程度，南韓正屬於一種「凍結式民主」的型態。或許南韓也經歷了所謂的兩次政黨輪替，以達「民主鞏固」之步，但就如同台灣一樣，即使經歷所謂兩次政黨輪替，但民主的意涵還沒有完全體現。只有當「民主被視為，唯一的遊戲規則」(Only Game In Town)時，民主才是真正的成熟。總觀之，南韓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市民社會」團體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如今，社民社會團體再南韓社會中還是扮演一個重要的推手，將南韓推向更民主的國家。